

城市和城市問題

古潛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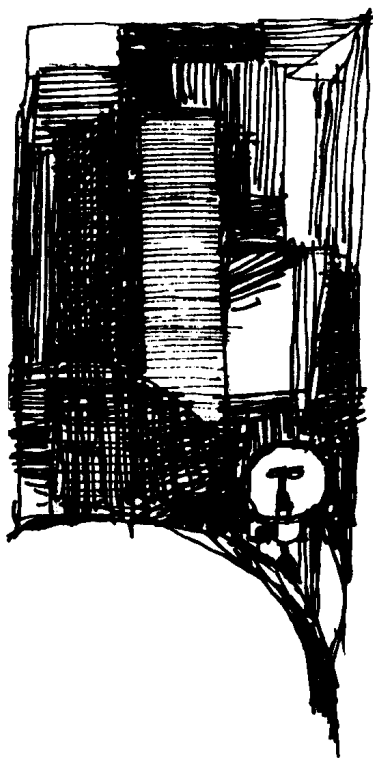
MAN IN THE CITY
OF THE FUTURE

Richard Eells and
Clarence Walton



城市和城市問題

古潛譯



MAN IN THE CITY OF THE FUTURE

*A Symposium of Lions International
at the University of Puerto Rico*

edited by Richard Eells and
Clarence Walton

城市和城市問題

理查德·伊爾斯、克拉倫斯·沃爾頓編著

古 潛 譯

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
香港九龍尖沙咀郵箱5217號
(登記證內版僑台誌字0066號)

港澳總代理：張輝記書報社
香港利源東街四號二樓

台灣總代理：新亞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八四號
郵購劃撥帳戶110075

1977年10月第2版

定價：HK \$4.00 NT \$40.00

封面設計：蔡浩泉

MAN IN THE CITY OF THE FUTURE: A Symposium of Urban Philosophers edited by Richard Eells and Clarence Walton. Copyright © 1968 by The Trustees of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Macmillan Company.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Second Printing

March 1975
October 1977

城市和城市問題

目 錄

理查德·伊爾斯	一	過去和現在的城市問題
克拉倫斯·沃爾頓	二七	城市危機和小城市
瑪格麗特·米德	五	公元二〇〇〇年的東京
松下 昌 年	六	談城市發展問題
維克托·烏爾基施	九〇	城市文化與城郊文化
彼得·霍爾	一四〇	替人類服務的城市
詹姆斯·W·勞斯	一四	如何興建未來的城市
康士坦丁諾·多西亞蒂斯	一八〇	人類城市的重建
克拉倫斯·沃爾頓		

過去和現在的城市問題

理查德·伊爾斯
克拉倫斯·沃爾頓

在短短三十年以後，人類就會跨過有史以來最令人興奮的時刻：進入一個新的「一千年至福」。Chiloi（希臘文的「一千」）這個字，無論在現代人或是古代的希臘人看來，都具有一種無可抗拒的吸引力，令人精神為之一振。即使在宗教上，也有許多人相信，基督會在隨後一千年重臨作和平的君王。儘管沒有任何教會正式承認這種想法，這些人却期待着這個「一千年」。這種基督教的憧憬，其實和柏拉圖「共和國」書中的伊爾神話並無太大的不同。它預言靈魂離開了肉體，到另一個世界修煉了一千年之後，會再回來。

究竟公元二〇〇〇這一年會象徵烏托邦夢想的實現，還是象徵一個更大的災禍降臨，便得由人類在以後三十年中的所作所為來決定了。因為當代人好像古羅馬的雙面神，要同時在各色各樣的問題中回顧與前瞻。他的預言，總是由他的經驗鑄造出來的。以人口增長的問題為例，爲了認識這種增長怎麼樣令人觸目驚心，他便得回顧過去，以獲取他所需要的有關事實。人類經過數千年的時

間，才增加了十億多人。但這個增加數字，是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五年間達成的。這期間人口由二十三億跳到三十三億。真的，就算我們執中地只把發展中國家百分之三的人口增加率計算在內，到了一九八〇年，便會有另一個十億人在地球上出現。短短十五年間，便增加十億人，這在人類歷史上還是空前的事。

每年百分之三的增長率表示人口在三十年內會增加一倍，在一個世紀內便繁衍為十八倍。如果這個龐大的統計數字把人嚇了一跳，我們不妨作一個可行的比較，切切實實地說清楚這件事。每年世界人口增加五千五百萬，這樣下去，就會產生一個人口相當於英國、法國或意大利的國家。同樣情況下，美國每個月也產生一個人口跟托利多一般大小的城市，而每年便增加一個新的費城。在本書「替人類服務的城市」一文中，詹姆士·W·勞斯指出：自一九四〇年以來，巴爾的摩所增加的人口，比密耳瓦基城的人口還要多，在二十年後增加的人口，會跟美安密差不多。在同一段時間內，三十五里外的華盛頓，人口將會加到跟巴爾的摩的一樣多。

此外，另一個事實是：未來增長的人口，將有五分之四出自世界各後開發地區。那我們對於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的城市規模，便不得不加以密切的注視了。在這些後開發地區中，有些城市擁有居民五十萬，有些城市在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六〇年人口三倍於此。在公元二〇〇〇年的時候，預期拉丁美洲有百分之四十七人口要住在這樣大小的城市中。在五十年代的時候，墨西哥城、聖保羅、波哥大、瓜亞基爾、基多都比原有的人口增加了兩倍。假如我們以這個經驗作為指南，為將來城市增長而訂的計劃，便得由公私兩方面的策劃人認真地加以處理了。

建設一個更宏偉壯麗的城市底夢想，是一切烏托邦計劃最基本的部分。路易士·孟福注意到一個事實。「從柏拉圖到貝廉米，所有烏托邦大都是通過「城市」這個名辭來加以闡述的。」這是有關城市發展史的推想中較有說服力的一個觀點。孟福是一個對烏托邦和城市甚有研究的人，他得到的結論是，烏托邦真正的概念不是一種希臘式的空想，而是導源於歷史事實的，那麼：「第一個烏托邦本身就是一個城市。」城市的構成是一種社會的革新，它悠長的歷史顯示，那是一種社會精神文化力量和經濟結構結底奇妙的交流。一個有關這兩種關係的草圖，能提供各種有趣的看法。

商業和前工業城市

根據可追溯的資料，到了公元前三千年左右，才出現了對當代西方文化有直接影響的初期城市。早期城市的形成，是農村結集的結果。這些農村是由一個遊牧獵人統領的，後來他漸漸成為坐鎮一方的首領，保護那些尋求安全的農人。獵人國王時而會跟其他村落或城市打仗的，很自然便需要建造一座護城牆了。這座城牆，除了有防衛的功用之外，還得履行三種艱鉅的任務：劃定國境，聚集民衆和創造文化。對外來的侵畧有所防禦，也就等於使城內居民免於受奴役、兵役之苦，因而有餘暇來創造很多生活的花樣。

因此，城市便成了藝術、思想、及其他豐富人生的活動的中心，而「不單是只為工廠、倉庫、兵營、法庭、監獄，和司令部等等而設的實用組織。」那是一個諾言。「歷史名城遺留下來的塔和

圓頂，提醒我們這個諾言仍未完成。」這些古城終於讓公元前七世紀至四世紀間興起的希臘城邦所取代。每個城邦都有一個衛城，那是神廟的所在，是城邦大部分活動的中心。最後這個業已為市區中心的衛城，又為公眾會場（Agora）或市場所取代了。

即使在早期的日子中，城市已經是思想家和行動家的發祥地（現代作家常常批評說這是我們這個科技時代的特徵）。希臘的哲學家，只關心自由和智能的增長。他們是思想家，對生意人仍懷有疑心，結果只有外國人才許操這種「賤」業。這些外國商人，這班行動家，只要一日可以做生意賺錢，便懶得管政府是什麼形式了。不過要指出的一項事實是：公眾會場漸漸取代了城峯的位置，成為法律、政府、工業和社交的中心。

在一種意義上，羅馬人以公所作為商業、行政、裁判、宗教的中心，性質跟希臘人的公眾會場是一樣的。但在羅馬的價值觀念中，很少滲入商業上那種企業的精神。公元三五〇年，在帝國覆亡之前，每年公眾假期的總日數超過了二百天；顯著的消耗，房屋供應情況的惡劣，昂貴的租值、密集的人口，對較遠國境的剝削、羣衆的慘況，成了這個寄生國度的特徵。在一世紀的時候人口是一百萬人，到四世紀的時候，竟然降到一萬七千人，這就是羅馬的故事。

雖然宗教文化和商業的結合，是需要多於方便，在基督教的影響下，並沒有好好的聯合起來。聖·約翰·奇里蘇斯頓宣稱：「沒有一個基督徒宜於做商人，如果他想做的話，便應該給逐出神的殿。」在十一至十二世紀的時候城鎮開始發展了，這主要是歸功於商人的領導。他們的影響力這麼大，連聖·湯瑪士·亞奎那也不得不說：「一個良好的社會，必須謙虛地使用商人。」舊有的緊張

不安鬆弛下來了，這多少跟文藝復興和啓蒙運動有關，因為這兩個運動，都加強了生活的俗世化。就是這個文化的高潮（相伴而生的人文主義強調物質方面的生活，而理智主義則強調量的發展），使一個農業社會能夠過渡為一個工業社會。

即使在前工業時期的世界裏，也發展了一些城市的模型作為有趣的典範。例如十八世紀的倫敦，正好代表了一個具有前工業生態的區域：城市中心是個富人雲集的地方，貧苦人家則成羣成羣的散佈在倫敦城牆的外圍。倫敦在一七二〇年的情形就跟美國二十世紀初的情形一樣。在一九二〇年的時候，畢里士公爵描述美國的城市說：中心區給十五至二十家最有錢的人家吞佔了，而向外伸展的市郊地區，則遍佈窮人的住宅。經過了一個世紀，英國才把這種情形倒轉過來；而美國則只花了三份之一個世紀。今日美國的城市中心為窮人佔居，它的範圍，因為黑人和波多黎各的移民而日漸擴大。

拿美國人口增長的方式和歐洲方面的歷史比較，也是饒有趣味的事。舉例說：荷蘭在十六世紀的人口增長，主要集中在鄉間和小鎮中；直到一五七五年，阿姆斯特丹、萊登、哈本、德爾夫特和鹿特丹等城市的中心區才開始擴張。美國的情形也很相似，我們早期的人口增長也是在鄉間和小鎮中，直到現世紀才把這個方式大大的倒置過來。太強調美國城市人口下降這一點，自然是一種過份大膽的推測，不過美國城市的人口經過一段時期的激增後又稍稍下降，却是一個事實。人口下降的原因仍未知道，但城市的發展和經濟繁榮的關係却似乎是非常明顯的。

西歐一個很顯著的特點是：西面從彼得堡起，直到鐵里伊斯特止，在這條直線範圍內的婦女結

婚年齡都是相當高的，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變。但在世界其他絕大部分地區的婦女，結婚年齡都早得多，而且大部分婦女都結婚。在西歐許多男子和婦女都不結婚，結果便形成了一個包括了僕人和不婚親戚的典型家庭，這種方式的重大後果是它減弱了耕作的地力和使西歐一般經濟情況迅速轉變的潛力。工作少了，孩子也得少生。美國也想追隨這種遲婚方式；但戰前的現象剛剛相反，結果市區人口激增，造成紛亂的現象。

定義和概念

市區人口的暴增使我們很難為城市下一個定義。究竟應該根據它法定的邊界還是根據在它邊界內謀生的人數來下定義呢？一個城市，是否單單指它的中心區域而言？或是指一個核心環繞着許多衛星城鎮，以中心的引力把它們控制於一些特殊的軌道之中呢？抑或當代的城市只是一個「無有之鄉」？

公元二〇〇〇年美國的情況會把這個問題說明清楚，因為它正在分別設計三個人口龐大的中心：「波士華」，「芝匹茨」和「聖桑」第一個由波士頓伸延至華盛頓，有五百哩長，可容納八千萬人，佔全國人口的四份之一。「芝匹茨」是集中在大湖區的大城，由芝加哥伸延至匹茨堡，可供四千萬人居住，約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十二。「聖桑」預示一個太平洋的集合區由舊金山市直伸到

聖塔·巴巴拉，大概有二千萬人口。在這三個區域中，差不多居住了美國半數的人口，同時囊括了最先進的科技人材和最優越最有創造力的條件。最小的單位「聖桑」除了五六個國家之外，總入息將是全世界最高的。

這些爲美國而設的計劃實在美妙，和某些學者爲日本預想的不同。當然，從某些方面來說，東京本身便可以提供一個未來國際城市的模型。目前這個城市有廿三個區和行政中心，容納了約九百萬人。但如果要根據在這個區域內謀生的人口來給東京一個定義的話，便得把這個所謂「東京都」的中心向四周延伸五十公里，把神奈川、埼玉、千葉包括在內。現在這些地區的人口已達二千二百萬，如果按照計劃結合成一個單位，公元二〇〇〇年時這個首都的人口便會超過一億。這種人口的錯綜關係是特別有相連性的，因爲日本本身是個已發展地區，其他未開發的社區圍繞着它。

這樣看來，根據法定的邊界來給一個城市下定義的傾向，顯然會產生一個脫離現實的概念。以美國爲例，在一九一〇年只有十個城市人口超過一百萬的；在一九六〇年的時候便有六十一個城市在案了。在一九五〇年以後的十年，這十個最大的城市中，除了一個之外，人口都有所減損，儘管市區的人口還在繼續增加。這個明顯的矛盾，是城市不同的定義所造成的，這些描述可能過份強調人口的流入而忽略了「流出」。一個富裕的社會中，市郊區人口的增長會比市中心快五倍，何以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之間大城市中有四份之三強的人口出自市中心以外的地區呢？真的，在僅僅十年間（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在市中心外城市的「殖民地」的人口已增加了百份之六十一·七，而城市中心的人口只增加了百份之一·五。但人數並不是最主要的問題；還可以從其他的範疇來看一

個城市，哥倫比亞大學的阿布朗教授就是就這些範疇的講法來申述這種爭端的：

美國城市擁有不同的類型：大的，小的；商業中心、工業中心；貧瘠的、富裕的；種類不同的人，居住的地方也不同。在估計美國城市的情況和命運的時候，應該把複型城市如紐約、芝加哥等和給里、底特律和大湍城或瀑布河等城市分開，因為後面這類城市是倚賴一種或兩種工業維生的，失之則衰亡。有些美國主要城市除了市長之外從不會改變什麼的；有些城市除了死氣沉沉的工場之外，什麼也沒有；有些城市的房子還多過人；有些城市全由老人所把持；有些城市大部分的房子都造在車輪上；像洛杉磯這類城市在一哩又一哩的擴展，現在還在擴展之中；而在加州有一個城市竟然靠埋葬死人來供養活人。

本書一篇文章的作者多西亞蒂斯也注意到這些不同，還對此有所諷嘲：我們已忘了「城市」這個字而太強調「人類居所」這個名詞了。可以預見，不斷移居大城區域的結果，將會產生一個他所謂世界城——由多個城市聯結起來的生活系統，構成一個龐大的「全人城」。如果世界城是市區發展的最終目的。那麼把這個中心變成一個適合人類生存和繁衍的地方便是一種挑戰。

二十世紀人類在進行這個全人城建造的時候，會意識到其中的過渡階段，不管這個城叫首都也好，大都也好，定義的問題總不及由人類本身不滿所引起的問題重要。詹森總統一九六五年三月二

日在國會作報告，其中一個注腳提出的定義是：「全市區域——市中心及其市郊」，這也許是最實用的一個了。至於未來城市的主要任務，詹森總統在一九六四年密歇根大學的畢業典禮中也指出了：「在大社會中，人的城市不單爲人類肉體的需要，和商業的要求服務，也爲美的慾望和共有的渴求服務」，這位行政首長對城市的熱心，使人想起他那頂頂有名的同宗，撒母耳·約翰遜博士的觀點，他宣稱：「對倫敦厭倦就是對生命厭倦！」

儘管在城市中有許多目前的好處，美國一直有許多反對約翰遜博士觀點的人，他們對我們社會的價值趨向有頗深遠的影響。在傑佛遜的啓發下，這班農村的烏托邦派認爲，城市是對那些使美國偉大的基本真義的一種威脅。十八世紀的倫敦和巴黎是以骯髒，侷促著名的，即使傑佛遜努力使國會通過了所謂一七九六年的「居留法案」。基本的動機是使國家的首都不設在「危險」的紐約。紐約後來成爲國家真正的活動中心，即使它位居於波多馬河一片沒有作爲的沼澤地。

這種偏見，可以說明何以城市會有籌款應開發需要時那段艱苦的日子，何以市區學校制度會在這樣悲哀絕望的情況中。關於市區教育這方面，一八六六年的農業監督所發表的意見也許是最典型的。他說：在建立國家教育這方面，正如一國的特徵一樣，農村比城市應該受到更多的管理。因爲城市會愈來愈大同化，人民失掉了特性，由一般流行的政見看來，他們甚至失掉了對國家的愛護。沒有知識的人都集中在一起，而幸運的小數則凌駕在國內大多數人的頭上，享受着超級的設備，獲得學術的名譽。他們只是少數。而在國內永遠無法生活下去的部分則注定愚蠢懵懂，看不見任何改革的跡象。梭羅也注意到城市化的入侵，他在較早時期已經斷定自己無法在十九世紀這個神

經過敏、擾攘、煩瑣的世界舒服地安頓下來。因而必須「起居作息，欲有所思，任由它去。」像梭羅這樣一個「站在一邊」自足的人之外，還有五個人都一致認為城市是他們發展經濟，獲得較大保障的地方，至少他們是這樣想。這種廣泛的共鳴的本質主要是經濟方面的，這表示商業在城市的發展和演進中擔負着實際的任務。

美國商業和美國城市

根據我們的調查，市區的發展和社會的一般經濟水平有關係是非常明顯的，因此商業便擔負了一項艱鉅的任務。假如這是真的，那麼目前的美國城鎮，在商業方面是堪以告慰還是引人憂慮的呢？美國的城鎮發展，在（甲）城市會因物質的便利而自然發展和（乙）創造的領導造成大大的不同，因為城市的發展是周詳地計劃的。有一個古老爭論，生動的闡明了這一點。

當然，在南北戰爭之前紐約、巴爾的摩激烈的商業競爭是著名的。在伊利運河開鑿之前，對西部的貿易主要是由巴爾的摩和費城推進的，特別是後者，當時是全美人口、財富和對內貿易首屈一指的地方。但有一個重要的條件是必須加以注意的，查理士·N·加拉伯有這樣的說法：

回顧過去，很容易便會根據紐約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來解釋它興起為稱霸全國的重鎮的原因——例如一個優良的港口，或是一片適合的平地，向西橫過紐約州，使興建

伊利運河比較容易。我們也可以指出，紐約商業團體組織性和企業性的行動，在初期也有助於保障它的成功。

這些成功的計劃包括：（一）獲取通過有利的拍賣法例；（二）組織來往英國的定期航線；（三）建立成功的海岸貿易，特別是把棉花從南部運上來。伊利運河在一八二五年修成，大大促進了這個城市的興盛。運河的驚人成就，刺激紐約的競爭者（波士頓、費城、和巴爾的摩）更有效地致力於競爭。這種回應在地理環境和科技條件方面反映出來的差異，不如三個城市商業上的中堅陣容反映的那麼多。

一八二八年，巴爾的摩的商人領袖，保證了一項當時未實現的交通革新，那就是開建由巴爾的摩至俄亥俄的鐵路，這表現出他們過人的魄力。賓夕凡尼亞州在費城的催促下，花了一千四百萬建造一條長達三百九十五里的「幹線」，把費城和匹茨堡連接起來，但聯結這兩個城市的運河和鐵路系統，仍然極之令人不滿。「幹線」始終不是伊利運河的勁敵，數年之後，便明顯地看得出，費城早就該供養一條鐵路了。如果說費城遭到逆境，波士頓也是一樣。著名的小查理士·法蘭西斯·亞當斯曾一度掌握對利物蒲的貿易；在倫敦的領導下利物蒲的企業和革新使這個城市免於沒落；但由於缺乏領導，波士頓的生意，却日漸轉讓給紐約了。

在美國中部，類似費城和紐約的競爭的，就是聖路易士和芝加哥之間所表現的關係。亞當斯也寫到，一八三七年的芝加哥，可能是整片國土中最暮氣沉沉的城市。城市破產，城市所在的一州也